

# 花亦芬：從台灣走向世界史，慢學有成

口述：花亦芬 72 孝 訪談整理：丘美珍

人文之路，需要時間融合淬煉，才能尋訪到屬於自己的風景。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分享她一路以來的學思歷程，發人省思。



花亦芬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史、社會文化史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以及現代德國史、史學思想史。  
曾獲國科會傑出學者養成計畫獎助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曾任《臺大歷史學報》主編。  
2014 年與史學界朋友合作成立臺灣第一個歷史學術共筆部落格及臉書專頁《歷史學柑仔店》，推廣「公民史學」。

新作《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是臺灣第一本探討德國兩次轉型正義的專書，期待以此書為當下的公義努力，讓台灣跳脫仇恨的轄制，留給下一代最珍貴的禮物。



**Q：回顧妳一路以來的歷程，大約什麼時候開始確立了生涯的方向？那時經歷過什麼樣的思考和反省？曾有過什麼樣的選擇？**



大學時我讀的是歷史系，在大二時接觸到西洋藝術史，深深被吸引，開始想要更進一步瞭解歐洲歷史文化，所以我開始主動到圖書館找書，想要更進一步瞭解更多。後來也決定要出國留學。大三時，我開始找老師習畫，希望對藝術能有更全面的體驗。



▲與班上同學一起為校內詩歌朗誦比賽作準備。

▲讀北一女時，與班上同學一起出遊時合影（第一排左邊著米白色毛衣為花亦芬）。

後來，我到德國科隆大學研讀藝術史，因為想要把基礎打穩，所以決定從大一重新讀起。正式進入德國大學後發現，德國對藝術史入門的訓練，有一套「慢學」邏輯。

例如，為了讓學生可以閱讀古籍及跨界文獻，學校非常注重語言的訓練。跟藝術史相關的語言如拉丁文、法文、英文、義大利文，都必須涉獵。對一個剛從台灣去的學生來說，這的確是相當沈重的功課壓力。我還記得自己在某一天的考試中，必須同時用德文、拉丁文、英文應考，那時真的很辛苦。

語文越學越多種之後，我也體會到，要學一種新的語言，每天固定撥出一些時間學習，讓自己產生與這種語言聯結的語感，是比較容易的。

我後來花了2年時間修拉丁文。許多文藝復興時期的史料，都以拉丁文撰寫而成，有這個語言基礎後，我得以閱讀第一手的典籍文獻（如藝術家的契約、手稿、古籍），這讓我得到更深更廣的滋養。德國大學重視語言能力的培養，是希望學生能夠具備自己不斷探究學問根源的能力。畢竟，知識是人為建構起來的產物，一個好的學術訓練過程，應該培養學生具備可以重新檢視知識建構過程、並且提出更具創新見解的能力。

剛開始時，我對未來生涯走向並沒有特定限制在哪個領域，覺得往文學創作、媒體工作或往學術方向發展都可以。一直到了讀碩士班時，才決定走上學者這條路，因為我希望透過學術研究和教學，幫助台灣社會往更好的方向前進，而且自己也具備足夠的知識與見解，可以跟世界進行有意義的深度對話。

## Q：後來你曾經在德國求學多年，請分享你初到異地時，所經歷的文化衝擊，以及後來心境上的轉折。這段留學生活，對你人生的意義為何？



德國大學的授課方式，很自由但也很嚴謹。在那裡，授課的方式主要分成兩種：由教授以演講 (lecture) 形式進行的大班課，以及小班制的討論課 (seminar)。

大講堂的演講課，學生可以自由聽講不計學分；小班制的討論課才計算學分。所以，在討論課的課堂上不論是課前準備，課堂中的討論，課後的書面報告，都不能輕忽。

但如果在系上的討論課之外，有自己特別研究的興趣，你可以自行擬定一個「獨立研究計劃」。所謂的「獨立」，就是得到系上相關領域老師認可這個研究題目是有意義、值得探討，在系上提供的課程之外，不是透過老師排定好的討論課做報告取得成績，而是你進行個人有興趣題目的獨立研究，到期末提論文讓老師評分來取得成績認證。

在德國，課堂上的討論，主要是針對知識的各個面向來討論，這種「相信知識有待檢驗」以及「就事論事」的論學方式，是台灣的大學校園還比較少見的。

另外，我也在德國看到「慢學」的好處。德國學制的訓練嚴格且紮實，相較之下，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來完成。

人文學科的訓練，的確應該重視紮穩基礎，多元探索，養成深厚的底蘊，不宜速成；否則，很容易變成人云亦云的口耳相傳之學，最終隨波逐流，失去自己的主見。

## Q：回國之後，你身兼教學與研究兩種身分，請分享你對「教與學」的體會，你覺得要成為一個好老師，需要做好哪些準備？



一個好老師應該在課堂上開啟學生對知識的好奇心與熱情，引領學生討論，能做具有批判性的長遠思考。

歷史學是一個進行綜合判斷的學科，如何與時俱進，對過往的種種提出更好的詮釋，這永遠是透過研究轉化到豐富教學內涵的考驗。對我來說，教學絕不可能一直重複同樣的教材與一成不變的詮釋。

這些年來，為了教學，我不斷充實了其他跨領域的知識，補充教學的資源。

例如，我這學期在研究所開了威瑪共和國的課，除了原始史料外，我也要求學生去看 1920 年代德國的電影，或當時的藝術品，好好了解當時德國生活的氛圍，鼓勵他們對那個時代有更豐富的歷史想像。

我在台大教書，不斷鼓勵學生將自己培養成「主動學習者」，上課方式也一直往這樣的方向來設計。每週他們都必須上台報告，因此，他們必須學習如何轉化他們所讀到的材料，而不是照本宣科。當然，在解讀文本資料的過程中，學生也可能誤讀或是理解方向偏差，但他們上台報告時，我們就可以針對他們還不夠理解的地方進行講解或討論。

在期末我會讓他們透過小組（有時是全班）合作，一起完成一個比較有難度的專案（project）。基本上都是設定可以公開展示的成品（例如，可以發表在網路上），或在期刊登出。這些期末作業，有時我也會讓同學參與評分。讓他們可以學習到，如何用比較理性客觀的角度，來看自己與其他同學努力學習、以及團隊合作後的成果。

我也曾經參與過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的討論。我覺得國民教育階段教學的重點，應在於啟發學生對歷史這門學問的興趣，鼓勵他們產生好奇心，能提出有進一步討論意義的問題，願意進一步去讀教科書以外的相關書籍，並從閱讀中，產生進一步思考、探究的求知熱情。

事實上，不只是歷史教育，我覺得國高中階段的教育重點應放在：讓學生透過課程，看到各種知識豐富有趣的面向，進而產生主動去汲取教科書之外優質知識的興趣，從廣泛閱讀產生好奇心，並對進一步探索各種知識有基本的信心，而不是在以考試為導向的情況下，為了所謂「區分出鑑別度」，讓很多學生在多元學習各科知識上的基本信心都被擊垮了。

## Q：在經歷過多年的學術生涯之後，妳已經成為一位成熟的學者，能否以 3 個關鍵字，展現妳對學術工作的思考和行動？



我覺得第一應該是勇敢地面向自己的社會。第二是不斷關心人存在的處境。第三是活潑地豐富跨領域整合的思考。

藝術史這學問常常被想像成風花雪月，但歐洲的藝術家一直有「參與社會」的傳統，因此歐洲藝術的面向豐富而且創新，可以入世甚至做出社會批判。有些在現實社會不容易明講的議題，藝術家可以透過非文字的視覺創作來著墨，進行社會批判或思想啟發，而社會大眾也樂於學習如何了解到他們傳遞的訊息。所以，藝術教育在西方是很受重視的教育內容。

反觀中國的藝術傳統，常常是出世的。文人畫的傳統中，創作者比較常把藝術當作游於物外、寄託出世情懷的園地，所以，這樣的創作傳統，常讓藝術與現實世界沒有交集。

**19 世紀法國寫實藝術的畫家古斯塔夫·庫爾貝 (Gustave Courbet) 曾說：「我的畫筆就是我的武器！」畢卡索也曾說：「藝術是為了揭露真相而虛構出的謊言！」所以，**

越有思想見地的西方藝術家，他們的作品可以探討的內涵越深厚，藝術變成創作者自由表達的載體，不再侷限於美學的線條或技法。

## Q：談談你新書《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在其中你最想對讀者傳遞的訊息是什麼？



最近幾年台灣講轉型正義，往往是從司法和政治的角度切入，比較容易引發疑慮。長期以來，因為威權政治引發的社會對立，讓我們很難在現有的民主基礎上和解。這本書我想讓大家看到，要把轉型正義做好需要漫長的過程，但是重點不在清算，而在處理社會的傷口，喚起療癒，希望過去的錯誤不要再發生，也希望加害者和受害者都可以從這樣的創傷中走出來，以免這樣的傷痛繼續不斷滲入我們的下一代的心靈。

## Q：未來 10 年，你最想做的事是甚麼？



我希望能繼續寫書。我已經邁入 50 歲了，我覺得 50 歲是一個非常棒的年齡，在專業上已經成熟，體力上還不差，可以為社會付出自己的力量。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察覺到，現今的台灣，不論是面對過去或未來，都需要更前進、更開放的思考方式，也需要更豐富的觀點，我希望透過寫作與大家交流，帶給這塊土地更寬闊的視野。

我設定自己是一個關心公共事務的知識份子，期許自己能為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貢獻自己的所知所能。在回國這些年，我親眼看到台灣這塊土地面臨不少困境，希望能跟這塊土生土長的家園站在一起，面對並且協助解決問題。■（圖片來源：花亦芬提供）

花亦芬部落格  
[yfhua.blog.ntu.edu.tw](http://yfhua.blog.ntu.edu.tw)



▲近年在德國作研究時的留影。



▲2016 年 8 月《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新書發表會。